

墨家思想与中医学的关联性

★ 佟晓洁 鲍晓东 (浙江中医药大学 杭州 310053)

摘要:通过整理分析各家研究墨家思想的成果,总结出与中医学关联较为密切的范畴和观点,主要从墨家逻辑思想、认识论及墨家“五行毋常胜”观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得出作为先秦诸子之一的墨家,其思想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墨家对类、故、理的逻辑提出,具有创见性。这种创见性对中医类比思维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墨家的认识论对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一致性以及重视临床实践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墨家“五行毋常胜”的提出是对五行生克关系中量变到质变过程的阐述,与中医对疾病发展过程中的量变与质变的认识具有密切的联系。通过这些方面的探讨为中医学理论的源流及哲学基础,提供研究线索。

关键词:墨家思想;中医学;关联性;综述

中图分类号:R-092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hist ideolog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NG Xiao-jie, BAO Xiao-do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Hangzhou 310053

Abstract: Through sorting and analyzing various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the Mohist ideology, this article summed up several categories and viewpoint which are connected closely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 Mohist logic thinking, epistemology and the "Five Elements Wu Changsheng"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is works demonstrate quite a few insights on the closely relationship between Mohist ideology, as one of the Pre-Qin Scholars, and TCM theory formation in their thinking. Therefore, these theories provide valuable clues for the study of origin and philosophical basis in the TCM theory.

Key word: The Mohist ideolog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latedness; Summary

“奠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先秦诸子百家之学,是《内经》理论发生的文化背景。”^[1]形成于秦汉之际,以《内经》为标志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充分吸收和利用了繁盛于先秦时期的中国古代哲学、逻辑学、科技等领域的先进科学成果。作为先秦诸子之一的墨家,其在哲学、逻辑学上的学术思想必然会渗透至中医理论体系中。目前对于儒、道等思想对中医学影响的研究,以及对墨家思想的专门研究较多,但对墨家思想与中医学关联性的研究,则略显不足。因此,有必要对墨家思想与中医学关联性范畴的研究情况,作一整理、总结和分析,为进一步探讨墨家思想与中医学关联性,提供理论线索。

1 墨家逻辑思想与中医学关联性范畴的研究概况

墨家逻辑思想中的范畴很多,最引人注意的是“三物”。“三物”即指“类”、“故”、“理”。“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墨子·大取》据孙诒让校移,以下引自《墨

子》均只列篇名。)

对《墨子》书中“类”的解释有不同的说法。曾昭式认为类“是指客观对象所具有的同异性”^[2]。张晓光用《墨经》的原文将类概括为:“具有‘偏有偏无’属性的不同事物或现象的综合”^[3]。王月玲将类定义为“事物间性质相似或相异的关系”^[4]。谷振诣总结前人理解的“类”有四种解释,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本质属性’与‘相似性’的解释在理解《墨经》中‘类’的概念时都不可或缺”^[5]。宋赛花和肖意贞则对先秦逻辑上“类”概念的特点进行了探讨和总结(其一,“主要从概念的内涵方面,即从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去把握类的规定性”;其二,“从对类概念的实际运用开始,逐渐发展到对‘类’概念本身的考察”;其三,“与实际生活联系紧密,具有认识论和伦理学上的意义”),其总结的三个特点均符合墨家思想中“类”概念的特点^[6]。本人偏向谷氏的观点,即“类”包涵本质属性和相似

性两个内涵。由本质属性寻找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从而进行类比的思维方法,正是中国传统医学思维的特色,可见墨子“类”概念的提出与中医类比思维方法具有密切的联系。

与“类”不同,对于“故”和“理”的概念大多数学者的解释基本一致。所谓故,“是事物生成的原因,而其本身又是其他事物发展的结果。”理(有时称为“法”)“就是事物发展的条理,也就是规律。”^[7]

虽然众家对《墨子》中“类”的理解略有出入,但这并不影响各家对墨家提出“三物”的历史意义和地位的较高评价。“三物”中的“类”和“故”作为逻辑学的概念,早在墨子(前期墨家)就已经提出,后期墨家(《墨经》)继承和发展了“类”和“故”,并且发见了“理”的概念。正如杜国庠言:“墨子在逻辑方面,还有两件非常突出的重要发见,就是类和故的发见。这种发见,在中国先秦逻辑思想史上,墨子要算第一人。他不但发见了它们,而且有意地广泛地运用了它们,使他的理论放出了异采,同时也奠定了墨家逻辑的巩固的科学基础。”^[7]秦彦士指出“类”概念的提出“使墨家在抓住事物本质方面作出了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即由儒家的伦类比附进入到真正的逻辑概念。”^[8]对类、故、理的逻辑提出,墨子是第一人,具有创见性。这种创见性对中医类比思维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孙中原和杜国庠分别从本体诠释哲学的角度和辩证法角度提出了“故”、“类”、“理”的哲学性质和辩证关系。杜国庠“从察类、明类而达到明理,由明理而达到明故”,“明故对于察类也有积极的帮助”的阐述中,辨析了三者的辩证关系^[7]。孙中原明确提出“‘故’、‘理’、‘类’三个范畴,概括了世界物质本体的因果性、规律性与类别性三个侧面的一般性质”^[9]。其对“类同”、“类异”、“法同”、“法异”和“同名异实”、“同实异名”等问题的探讨时,提出了墨家“同异交得”的矛盾观、“两而勿偏”的全面观和“古今异时”的历史观的辩证思维方法^[10]。由此可见名、实问题也是类的问题,是现象和本质的问题。

匡萃璋肯定了《墨经》等先秦著作及思想家对辩证逻辑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指出“辩证逻辑是中医逻辑方法的重要特点”以及辩证逻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都是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之中。”作者还以“六经分证以明其‘故’,合病并病以辨其‘类’,‘以阴阳互根之体,见阴阳离合之用’就是其‘理’”为例,说明中医学的辩证逻辑方法^[11]。李志民、鲍黎明从《墨经》逻辑思维方法中提出了三点对

《内经》的影响,其中第一点便是“三物法”对《内经》的影响。指出“《内经》从‘天人合一’整体观去认识人体生理病理,正是采用了这一逻辑思维方法。”将“‘天人合一’作为推论之故”;把“天地阴阳变化的客观规律作为推论之‘理’”;“《内经》正是运用这种方法(指‘类取’法)来认识疾病之规律”并指出“《内经》大量运用‘类予’的逻辑思维方法,亦就是人们常说的‘比类取象’法”^[12]。

任秀玲在其《中医理论范畴》的专著中,谈到《内经》从先秦逻辑中引进的范畴有“形名”、“应因”、“故”、“类”、“理”、“说”等逻辑概念。并逐一详细论述了它们对《内经》的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所起的重要作用。^[13]

2 墨家认识论中与中医学关联性范畴的研究概况

讨论墨家认识论时,大多数学者们都会分前期墨家的认识论和后期墨家的认识论来进行讨论。前期墨家以“三表”为核心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后期墨家以“摹略万物之然”为目的和强调了“说知”、“为知”重要性的理性实证主义认识论,以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后期墨家在认识论上对前期墨家的扬弃和发展等三个方面,大多数学者观点基本一致。

虽然墨子(前期墨家)的认识论被定义为经验主义认识论,但仍有不少学者提出其认识论中存在不少重视实践和实际效果的实证主义因素,并且认为正是这蕴涵的实证主义因素,为后期墨家发扬实证精神的认识论提供了线索。如任继愈认为墨子的“三表”中以第三表为最重要,“是墨子的认识论的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思想方法。”^[7]而这第三表就是以实践效果为检验标准。詹剑峰利用《非攻》中墨子在辩彭生子所言的“来者不可知”的时候,引用古语曰“以往知来,以见知隐。”为例,指出了“墨子的认识论是始于经验,终于实践”的^[7]。

对于后期墨家的认识论,各家都表示了肯定的态度和较高的评价。任继愈论《墨经》的认识论“进一步贯彻了唯物的原则”,“全面地看到了感觉和思维的作用”和“重视实践”的特点^[7]。孙中原原则指出“《墨经》继承墨子认识论中的理性论因素,建立了感性和理性,经验与理论并重的认识论,表现了崇尚理论,理智和知识的理性论特质。”(《求真循法与理性——〈墨经〉科学精神今论》)^[14]。王福岗通过对《墨经》认识论特点的探讨,指出“《墨经》认识论对于丰富中医学知识和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起到了重大作用”,“先秦时期墨家首先提出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概念法则,并对人的认识进行了较科学的论述,奠

定了古代认识逻辑的基础。”^[15]

前期墨家以“三表”为中心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是先秦人们对世界规律性认识的方法,同时也符合中医起初乃至现今作为一种经验医学的认识方法。而诸多学者们乐于证实的墨家重视实践的观点,无论是前期墨家认识论中的实证因素,还是后期墨家经验与实证并重的认识论,都对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一致性以及重视临床实践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

3 墨家“五行毋常胜”观与中医学关联性的研究概况

五行学说从诞生到被引入中医学,作为其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就一直处于众多哲学家和医学家的争论之中。作为其主流学派——“五行常胜”派更是被讨论的重点。何爱华在辨析“五行学说有机械循环论和形而上学论”的观点时,分析道:“五行学说在历史上有两个派别,一派就是大家常讲的五行学说,也是中医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是五行常胜派。这一派的学术观点中,确实包涵着一些机械循环论和形而上学的成分”,通过探讨这一派别的历史发展,而得出“五行常胜派”在历史上居于的主导和统治地位,其主导作用在《黄帝内经》中也有体现。^[16]因此,就有不少学者也对中医学的五行学说提出了同样的批评。但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从五行学派的另一个非主流学派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医学理论中的五行学说。另一派,就是以兵家的孙武和墨家的墨翟为代表的“五行毋常胜派”。其观点认为“五行之间的关系,不论是相生、相克,都是相对的,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作者提到“就五行学说的引入医学并与医学相结合来说,尽管五行毋常胜派的学说并不居于主导地位,但却也占居一定的地位。”^[16]张登本和孙理军也指出《内经》在医学领域应用五行规律时,“涉及到具体医学实际问题时,就已经突破了五行之间的单向相生,单向相克关系”,发现并阐述了这两种关系同时并存,而且这两种关系是“互相的,是多向性的,……多层次,多方向的”,并总结说《内经》应用五行理论时,“并没有受五行哲学范畴生克制化的局限和约束”^[17]。

有些学者从“量、性”关系上进行分析。认为“五行毋常胜”的提出就是对五行生克关系中量变到质变过程的阐述,与中医对疾病发展过程中的量变与质变的认识具有密切的联系。“如果说相生、相胜原理是一种定性的研究,那么相制、相化原理则含有定量的因素,结果取决于速度、数量和比率。当

时的兵家和墨家,又由此再前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具有辩证意义的原理:‘五行毋常胜’;‘五行毋常胜,说在宜’。对此《墨子·经说下》的解释是:‘火炼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这是说,五行相克的次序不一定都是对的,关键取决于数量。”^[18]叶磊明确指出“‘相胜说’只注意到金木水火土的基本性质,而未充分考虑其量变因素,因此难免受到质疑。而‘五行毋常胜’之说便是在意识到这种片面性之后,对‘相胜说’的一种反思和补充。”以及“之后墨家又从‘宜’(量)的角度,进一步论证量的因素在五行胜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最后作者提出“五行毋常胜”观的历史意义在于,“不但提醒了人们对事物变化的多样性、复杂性保持清醒认识,也是对五行相胜说的发展,更给后世五行说在一个更高的逻辑水平上拓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说中医五行说对哲学五行说的许多修正都来源于这种认识和启发。”“因此《内经》在涉及具体医学实际问题时,往往突破五行之间单向的相生相克关系。”作者还通过孙子提出的“五行毋常胜”观点及孙子的生活时期,推测“五行毋常胜”的认识当不会晚于春秋”^[19]。

一些学者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合和观”和现代控制论的平衡观点方面进行探讨。何爱华通过与控制论的内稳定器系统的工作原理的比较,提出了“五行无常胜”论的最终目的是,使失衡状态达到重新平衡^[16]。王小平^[20]、李刚^[21]和梁晓平^[22]都从合和思想的角度,探讨了中医学在运用五行规律时,不是机械循环的生克作用,而是相生相制最终达到稳态的方式。这类问题的发见与阐述,暗示了中医学对五行学说的吸收,不仅仅是对“五行常胜”思想的吸收,而更多的是“五行毋常胜”思想的借鉴。正如张维耀所说:“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一种系统的逻辑体系。它是从某些基本概念和原理出发,不断充实各种具体的规定,层层推演,直至对研究对象获得完整的科学说明。”^[23]我们从中医理论中的五行学说的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不能忽视“五行毋常胜”观点对“五行常胜”主流观点的重要补充,同时也不能忽视具体的医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对其的充实和修正。

还有从比较文献中五行的排列顺序的角度来分析,五行的相生、相胜和无常胜的观点。坚毅也指出文献中五行排列顺序有三种:其一为金木水火土,出自《国语·郑语》,属于通俗的口语化;其二水火木金土,出自《尚书·洪范》,“具有一定哲理……反映世界一个逐步生成,从小到大的过程”;其三则为木火

土金水,“最早见于墨家学派的相胜说”,“富有哲理的说法”,表现了相生关系^[24]。申俊龙和魏鲁霞通过分析《内经》五行顺序与《尚书》和邹衍的五行排列顺序的不同点,指出中医中五行生克的含义“明显与邹衍相胜意义不同”,并指出“邹衍似无相生思想,相胜是战胜,消灭另一方,而中医五行的‘克’是克制,约束的意思”。明确指出中医五行思想与邹子五行相胜的区别^[25]。彭华提到“《洪范》之五行,既不是相生序,也不是相胜序”。作者认为最早的合作观,是史伯提出的“五行相杂”的合作观。作者认为“春秋时期,不但有五行相生思想,也有五行相胜思想。有的材料表明,五行相胜思想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五行相生思想出现的时间,似乎可以至西周时期。”作者提出墨子说五行,给五行学说注入了新鲜血液,“墨子的五行思想,明见于《墨子·贵义》”并通过对这篇的分析,得出“墨子谙熟五行之术”但“作风务实”,“不盲从”、“不迷信”。作者在分析《墨经》提出的“五行毋常胜”命题时,通过比较分析吴毓江、谭戒甫、伍非百、栾调甫、梁启超、孙诒让和毕沅等大家,对该命题提出的见解,最后总结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墨经》“五行毋常胜”的提出,“既破他家的五行‘常生’、‘常胜’说,又立自家的‘五行毋常胜’说”。认为墨子的“五行毋常胜”说就是从量变和质变的角度论述物质的变化^[26]。

另外还有从“常变”观以及“亢害承制”的角度来阐述“毋常胜”观点的影响。任秀玲则以《孙子·虚实篇》提出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五行毋常胜,四时无常位。”作为中国哲学“常变”范畴的雏形。为后世的常变观以及《内经》中的常变观的阐述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13]。可惜的是,作者虽注意到了孙子的“五行毋常胜”的观点,却没有提及墨子在这方面的贡献。邵雷和烟建华从中医“亢害承制”的角度,提出了“亢害承制”的思想是受到墨子“五行毋常胜”观点的影响^[27]。

小结:通过以上资料可以看出,目前对墨家思想与中医学关联性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不少学者涉及,并且提出的观点范围较为广泛,主要从墨家逻辑思想和认识论,以及墨家“五行毋常胜”观点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众多学者也充分肯定了墨家思想在中医学理论构建中产生的作用和历史地位,但仍有不足之处。本人在查找相关资料时也注意到,专门论述墨家思想与中医学相关性的文献很少,大多数这方面的观点,均是在墨家思想其他方面研究时顺带提及。墨家思想在先秦诸子思想中一直有其独特的

重要地位,蔡尚思评墨学时就曾说:“墨学优于先秦诸子,而不是先秦诸子优于墨学。”^[7]因此,不断挖掘墨家思想中有价值的内容,探讨其对中医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为中医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张登本,孙理军. 概论《黄帝内经》理论与诸子百家[J].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05,28(6):1-4.
- [2] 曾昭式. 从先秦文化特点看《墨辩》的“故、理、类”[J]. 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47-49.
- [3] 张晓光. 中国逻辑传统中的类和推类[J]. 广东社会科学,2002,(3):32-37.
- [4] 王月玲. 刍议墨家逻辑的历史命运及特点[J]. 理论与现代化,2002,(5):74-75.
- [5] 谷振滔. 论《墨经》的类概念[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1,20(1):57-60.
- [6] 宋赛花,肖意贞. 先秦逻辑史上类概念的发展[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2(1):44-47.
- [7] 蔡尚思. 十家论墨[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8] 秦彦士.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墨经》释读评议[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26(9):189-190.
- [9] 孙中原. 《墨经》的本体论哲学[J].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7(4):7-13.
- [10] 孙中原. 《墨经》哲学的价值[J]. 中州学刊,2002,(1):138-143.
- [11] 匡萃璋. 中医学的辨证逻辑方法初探[J]. 中国医药学报,1993,8(5):8-11.
- [12] 李志民,鲍黎明. 试论《墨经》逻辑思维方法对《内经》的影响[J].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88,(2):11-13.
- [13] 任秀玲著. 中医理论范畴——《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的基本范畴[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1.
- [14] 孙中原. 求真循法与理性——《墨经》科学精神今论[J]. 平原大学学报,2005,22(1):57-61.
- [15] 王福岗. 试论《墨经》认识论对中医学的影响[J]. 中医药研究,1999,15(1):2-3.
- [16] 何爱华. 关于五行学说的几个问题[J]. 医学与哲学,1981,2(3):71.
- [17] 张登本,孙理军,李翠娟. 论五行理论在《黄帝内经》建构中的作用及其意义[J].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7,22(1):13-18.
- [18] 周自强. 中国古代思想史(先秦篇)[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
- [19] 叶磊. 《内经》五行说源流考辨[J]. 方正学位论文数据库.
- [20] 王小平. 中医学合和思想研究述要[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1,25(6):418-420.
- [21] 李刚. 和合思想及其演变[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1(1):70-75.
- [22] 梁晓平. 试论阴阳五行的基本核心——平衡理论[J]. 中医杂志,2002,43,增刊:42-43.
- [23] 张维耀. 中医学与阴阳五行学说(二)[J]. 天津中医药,2004,21(6):482-485.
- [24] 坚毅. 论“五行”的辩证统一[J]. 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28(5):30-32.
- [25] 申俊龙,魏鲁霞. 论中医哲学方法的四大特征——以《内经》为例[J]. 兰州学刊,2005,(5):66-69.
- [26] 彭华. 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J]. 方正学位论文数据库.
- [27] 邵雷,烟建华. 亢害承制学说之我见[J]. 中医杂志,2006,47(11):808-810.

(收稿日期:2008-03-06)